

諺語歇后語淺注



谚语·歇后语浅注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柯德恩

封面字：杨修品

谚 语 · 歇 后 语 浅 注

李孟北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云南日报社印刷厂拣排 7 2 1 6 工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张：25.25 字数：361,000

1980年8月第一版 1980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 — 30,000册

统一书号：7116·722 定价：1.90 元

前 言

我生长在一个农民家庭里，从小在农村长大。四岁以后，寄居在外祖父家达十年之久。外祖父是个下中农，那时已有五十多岁，他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生活经验。从我懂事时起，就常常听到他在和人谈话时，喜欢引用俗话、歇后语、农谚，象什么“芒种不可强种”、“处暑找黍，白露割谷”、“听见蝼蛄叫，就不种地了”等等。我渐渐长大之后，也参加一些附带劳动，这时，外祖父就教我背“二十四节气歌”，并结合农业生产劳动，教我一些农谚，如“棉锄七道白如银”、“云向东，跑马一阵风；云向西，小鬼披蓑衣”等等。当时，我觉得这些俗话听起来顺口，容易记，用字也很新鲜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

但是，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外祖父引用谚语斥责我。有一年欠收，交租后剩下的粮食，只够吃八、九个月，差三、四个月的口粮。在冬天农闲季节，外祖母就煮一些瓜菜掺点玉米渣再加上一点糠掺着吃。连吃了两顿，我就不想吃了，那时我大概有十岁的光景。有一次吃晚饭，我吃了少半碗菜粥就把筷子撂下了。外祖母问我：“怎么的了？”我说吃不下去。我的话刚一出口，外祖父就大为震怒。外祖父一向是喜爱我的，对我的态度从来是温和的，而这次却一反常态，眉头紧皱，双眼圆瞪，一拍饭桌，声色俱厉地说：“宁穿过头衣，不说过头话，不吃，吃什么！你知道你将来吃什么？”于是，

他给我讲了他小时候吃糠咽菜的悲惨生活，一再教育我要吃得苦，不要拣嘴。这些话，特别是“宁穿过头衣，不说过头话”这句谚语，使我终生难忘。事过四十余年，记忆犹新，就象昨天发生的一样。从此以后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饭菜，我都不敢说“不吃”两个字。

后来家庭经济生活稍富裕，我就到城里上学去了，当时叫上“洋学堂”。学了一点书本上的知识，又成天与学生打交道，几乎完全脱离了农村生活、脱离了劳动。这样就慢慢变得“文雅”起来了，对“俗语”就瞧不起了，也就不再学、更不再用了。当然，语言也就变得越来越贫乏、苍白了。

重新和谚语结缘，这是参加革命以后的事。参加革命后就学习整风文件，在学习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时，关于学习语言的一段话，很触动我。毛主席说：

“为什么语言要学，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？因为语言这东西，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，非下苦功夫不可。第一，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。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，生动活泼的，表现实际生活的。”我过去从来没有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这个概念，更没有把它列为第一的想法。听了主席的教导，这才开始留心群众的语言，特别是当我和工农干部相处、和农民群众交谈时，我才逐渐感到他们的语言非常生动、有兴味。全国解放后，在工作中接触工农群众、工农干部的机会多起来了，从此，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才真正比较自觉了一点点。

在学习过程中，我逐渐认识到谚语、俗语、歇后语，是

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哈萨克族有句谚语：“最干净的水是泉水，最精炼的话是谚语。”确实如此，凡是好的谚语、俗话、歇后语，可以说是人民群众语言中的精华。人有了心，眼睛里就有了水。再看看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，就发觉我们的导师们是如此喜爱谚语、俗话，在文章中纯熟地恰到好处地多次引用谚语、俗话。毛主席的文章多处引用谚语、俗话，如：“看菜吃饭，量体裁衣”、“又要马儿好，又要马儿不吃草”、“懒婆娘的裹脚，又臭又长”、“三个臭皮匠，合成一个诸葛亮”，等等。导师们的榜样促使我暗暗留心搜集谚语，这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！

开初，留心搜集谚语，本来是准备为自己使用的，也是零碎的、时断时续的。近若干年，主要是劳动，时间多了一些，就比较有意识地去搜集，看书报杂志，遇到谚语就记下来；听工人、农民谈话，甚至听广播看电视，也记录，这样，谚语越积越多，后来达到两千多句。到一九七六年，有一个机会借到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资料室主编、兰州艺术学院文学系五五级民间文学小组编的《中国谚语资料》。这本书搜集了约数万条谚语，内容非常丰富。但是《中国谚语资料》是资料性的，精华与糟粕兼容并收，基本重复或仅有一字之差的为数甚多。我想，这本书做为资料是极为珍重的，但如果不加选择地公开传播，则似乎不很恰当。这也可能是这本书只做“内部发行”和印数不多的原因吧！

从我搜集谚语时起，就有一个渴望：如果有一本谚语集子，置诸案头或揣诸怀中，能随时翻阅，那该多么好啊！古

人集录过一些，如明朝人杨慎的《古今谚》，清朝人曾廷枚的《古谚闲谭》，不过所收的谚语数量较少。清朝人杜文澜辑的《古谣谚》算是数量比较多的一种，但谣、谚并收，而且其中不少谚语已随着时代的进步、变化和科学的发达，失去了意义；有些则已转化为成语了；有些则是糟粕；只有少数至今仍在通行。当然，在封建社会里，有些知识分子能够留意于搜集谚语、俗话，这已是难能可贵的了。但是，这些书毕竟不能满足人们现在的要求。因此，当我看到《中国谚语资料》时，就产生了一个想法：把好的谚语选注一下，争取公开传播，这也许是人们所希望的吧！

党中央一举粉碎了“四人帮”，扫除了妖氛迷雾，雨过天青，这就极大地激励了我编选这本集子的斗志。从七七年以来，便在前几年辑注的基础上，开始了正式编、选、辑、注的工作，在许多老朋友的鼓励帮助下，总算勉强凑成这个集子。这大概就算缘起吧！

谚语、俗话的产生是很久远的了。《古今谚》所辑谚语中，最早的指为“黄帝语”，这个说法未必可靠，因为关于黄帝这个人，还是史学家们讨论的疑案。即使算有黄帝这个人，恐怕谚语、俗话产生的时间还要早得多；它应是在文字以前就有了的。对语言学我是门外汉，虽然辑录了一点谚语，仍然是“成天打壶不认锡”，关于谚语、俗话的发生和发展却一点不懂。照我的揣度，谚语、俗话就其内容来说，是人们同大自然作斗争和进行阶级斗争以及生活的经验总结，好的谚语寓意深刻、意味深长。就其形式来说，有精炼、简练、生动、形象以及谐音、压韵、顺口等显明特点。

从语言的发展来说，似乎是语言的精华部分。鲁迅先生的家乡有一种“炼语”，是方言土语里经过提炼而含意深长的话，略似成语，机智简洁。看来“炼语”也是和谚语、俗话很相近的东西，甚至就是谚语、俗话，不过名称不同罢了！对这种“炼语”，鲁迅先生是极为称道的。

尽管谚语、俗话是语言的精华，但是在中国文学史上，似乎也经历过不同的境遇。大约在先秦一直到汉朝，谚语、俗话好象颇受相当一部分历史、文学、政治家们的重视。当时的所谓诸子百家，不少人是喜欢引用谚语、俗话的，流传至今的“众志成城”、“宁为鸡口，不为牛后”、“从善如登，从恶如崩”、“狼子野心”、“唇亡齿寒”等成语、俗话，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。到了汉朝，司马迁写《史记》，引用的谚语、俗话就更多了，诸如“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”、“利令智昏”、“桃李无言，下自成蹊”、“百里不贩樵，千里不贩粳”，等等。司马迁引用谚语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评论人物，其数量之多，在二十四史中，恐怕是首屈一指的。《史记》一书，就其文学价值，于古代史书中名列第一，这和它比较地能够吸收来自民间的语言，可能有一定关系。自魏晋六朝，降及唐宋元明清，在大多数封建士大夫的文章中，谚语、俗话的地位越来越不受重视。尽管谚语、俗话在劳动人民之中，仍在不断地丰富发展，尽管封建士大夫们也引用已经转为成语的古谚，但他们似乎瞧不起流传在群众口中的谚语、俗话。甚至象杜文澜那样留心搜集古谚的人，也只限于收集书籍上所记载的，而不收群众口头上流传的谚语、俗话。这

在他的《古谣谚》序言中，是明明白白宣称了的。更为甚者是《四库全书提要》的说法，他们认为“古谚多本史书，今谚则鄙俚者多矣”。其实，古谚多数是古代的“鄙语”、“俚语”，在他们眼里，似乎只要一“古”就被尊重，一“今”就被贱视，这是既荒谬又荒唐的。虽然谚语、俗话在封建士大夫们（他们把持着文坛）之中地位不高，但在白话文学中，特别是有人民性的古典小说平话中，却越来越得到重视。在元曲中，俗话开始增多了，如“丁是丁，卯是卯”、“银样蜡枪头”、“路遥知马力，事久见人心”等等，至今还流传着。继之，在著名的古典小说中，如《西游记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儒林外史》等，引用谚语、俗话就赫然多了起来。在这当中，以我国十八世纪的著名小说《红楼梦》最为重视谚语、俗话，据我粗略估算，仅仅《红楼梦》前八十回，曹雪芹引用的谚语、俗话，即达数百条之多。如“两面三刀”、“可着头做帽子”、“千里搭长棚，没有不散的筵席”、“拚着一身剐，敢把皇帝拉下马”等等。毫无疑问，《红楼梦》等古典小说，之所以至今仍被人们热爱，主要地取决于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，但是语言的接近民间，恐怕也是一个原因吧！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，谚语、俗话所受的待遇的冷暖变化，似乎显示出这样的道理：文学、文字语言越接近人民群众，谚语、俗话的地位就越高；反之，文学、文字语言越脱离人民群众，谚语、俗话在其中的地位就越低，甚至没有地位。文学史、语言文字史，也在证明着大多数好的谚语、俗话是劳动人民创造的，为劳动人民所喜爱的；它和剥削阶级的文化，特别是和

趋于没落的、反动的封建文化是尖锐对立着的。

真正赋予谚语、俗话在文学、语言文字中以应有的地位，这是“五四”运动才开始的。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文章、讲话、演说。在毛主席的光辉篇章中，所运用的谚语、俗话之多，之纯熟，之恰到好处，都是不多见的；特别是论述哲学、政治经济学、科学社会主义，常常用一两句谚语说明一个深刻道理。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鲁迅先生，同样重视谚语、俗话，他对“和尚种麻，不得”这句俗话的考证探索，说明了他多么认真学习谚语。在他的文章中多次使用谚语、俗话，如“打落水狗”、“恨棒打人”、“忠厚乃无用之别名”等等，足见他很重视谚语。在革命战争年代，在解放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，涌现出来的大量的优秀文章、作品，谚语俗话，被广泛引用了。社会主义革命，开拓了群众语汇发展的黄金时代。在这里，应该重复地提到《中国谚语资料》一书，在搜集谚语的工作上，做出了重大贡献。这是据我所知，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搜集了数量如此之多的谚语集。尽管这是一部资料书，但是仍有再版内部发行的价值和需要，我希望它能重新再版。

关于谚语、俗话，古人下过很多定义，有的说“谚，俗话也”，“谚，传言也”，“谚，俗所传言也”。有的肯定它，如说“寓教于文矣，或作口谚”。有的人客观地评介它，说“传言者，一时民风土著论议也”。《文心雕龙》作者刘勰则以文学评论家的口气说：“谚者，直语也，麀路浅言，文词鄙俚，有实无华，莫过于谚”。既承认它是直语，

又说它没有艺术性，这是封建知识分子的阶级偏见。一直到解放后，谚语、俗话才算得到了正确的解释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注释是：“谚语，在群众中间流传的固定语句，以简单通俗的话，反映出深刻的道理”。“俗话，通俗并广泛流行的定型语句，简练而形象化，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，反映人民的生活经验和愿望。”这种解释，是比较允当的。我想用关于谚语的谚语，来给谚语俗话作个注脚，似乎更有意思一点。

俗话说：“花草生自山中，谚语出自心中”。这就是说，谚语已经不是单纯地客观地描述或简单地反映事物了，而是经过了人的一番思维，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事物的本质或事物之间的联系。大多数好谚语，都在一定意义上或一定程度上符合客观事物的规律。如“瓜无滚圆，人无十全”、“初生牛犊十八跌”、“千金难买回头看”、“吃一堑长一智”、“前门赶走了虎，后门进来了狼”、“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”、“舍不得孩子打不到狼”，等等。都包含着一定的辩证唯物论观点和历史唯物论观点。恐怕这是谚语富有强大生命力的最重要之点吧！

谚语说：“俗话不俗”。这是说大多数谚语、俗话并不俗气，既不庸俗，也不粗俗。谚语、俗话被许多古代封建文人视为鄙俚之谈，不容其登大雅之堂，这句俗话就是对他们的斩钉截铁的抗议。俗语中，确有一部分是庸俗的，但这不是谚语的主流。大多数谚语、俗话所包含的道理是很深刻的，如我们常说的：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”、“不是冤家不聚头”、“灯不亮要人剔，人不明要人提”、“木不钻不

透，话不说不明”、“人有失言，马有失蹄”、“箴多闲缠，话多闲言”、“少一口饭不饱，少一根柴不涨”，等等，对事物的观察多么细致，对事物的联系及其发展的必然性看得多么准，对于事物的对立斗争的变化，了解得多么深刻，甚至对于质量互变的关系也看得很准确。俗话，俗吗？不俗。

谚语又说：“话要俗说才能传得远”。话能否传得广和远，取决于话是否反映了客观规律，是否是真理。就其形式来说，群众认为通俗的形式，才能传播得久远。无疑，这种观点才是正确的。把深刻的道理以通俗的形式表达出来，就容易为广大劳动人民所容易接受、容易牢记。古代有许多谚语如“远水不救近火”是《韩非子》上就引用过的，至少已流传了二千多年了，而且至今仍为广大劳动人民所熟悉。可见，只要内容符合客观事物的规律，谚语、俗话可以流传得既广泛又长久。如“火大没湿柴”、“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”、“话多了不甜，胶多了不粘”、“东吴招亲，弄假成真”等等，是全国各地劳动人民都会说的。至于什么文雅的汉赋、六朝的骈文，尽管词藻华丽，但在八亿人民中，能记得的人又有几个？即使记得，又能记得几句？

哈萨克族有句谚语：“最干净的水是泉水，最精炼的话是谚语”。对谚语的形式特点，给了最好的说明。事实正是这样，谚语、俗话是极为精炼的，有的只用三个字就说明了一个道理，如“马后炮”、“隔锅香”。一般则用五、六个字或八个字就说明一个相当深的道理，如“无古不成今”、

“无丑不显俊”、“歪木头，直木匠”、“万事开头难”、“头三脚难踢”、“十个厨师九个淡”、“不登高山不知平地”、“千金难买心中愿”、“綑绑不成夫妻”等，这些用许多句话才能说清的道理，但是形成谚语、俗话，只用寥寥数字或十数字就行了。难怪劳动人民这样喜爱它。

俗话还说：“水滴积多盛满盆，谚语积多成学问”。确实如此，谚语、俗话几乎涉及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的各个领域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，大到政治，小到生活，都有谚语总结起来的经验。且不说，看天有“东虹日头西虹雨”、“早霞不出门，晚霞行千里”等农谚，就连吃饭、走路都有谚语，如“黑泥亮水灰是地”、“紧走滑，慢走桥”、“少吃一口，舒坦一宿”、“健胃怕烂饭”、“气上房，不用尝”。这些确确实实是学问啊！

既然谚语、俗话这么好，为什么要选它呢？这里也用得着一句俗话：“十句谚语五句真”。我们说谚语、俗话是群众语言中的精华，这是就劳动人民创造的多数谚语而言的，并不是说每一句谚语、俗话都是好的、正确的。“十句谚语五句真”，也不是说现有的谚语只有一半是好的，另一半都是坏的，而是说对谚语、俗话也要一分为二，既要看到其中的精华，也要看到其中的糟粕。谚语既然“出自心中”，就是经过了人们头脑加工的。而人是分为阶级的，思想上是打上了阶级烙印的。不同的阶级，不同的思想创造出来的谚语、俗话也就不同。在解放前的数千年的阶级社会里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，即使劳动人民创造的谚语，也难免在不同程度上受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。在现在通行的谚

语、俗话中和《中国谚语资料》中，确有一部分谚语、俗话是剥削阶级分子或具有浓厚剥削阶级思想的人编造的，它的内容是错误的，甚至是反动的。有一些谚语赤裸裸地鼓吹“剥削有理”、“压迫有理”的反动谬论，如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”、“人无横财不富”、“杀不了穷人，当不了富汉”、“杀不了穷人，当不了大官”等等。这一类谚语反映的剥削阶级的反动透顶的道理，反革命道理。对这些，只能彻底批判，绝不能当作正确的道理来流传。有一种则是宣扬资产阶级的“剥削经”，叫嚷：“若要发，穷人头上刮”、“放你千日货，自有赚钱时”，这些当然不能再传播。还有一些谚语、俗话，是受到剥削阶级思想毒害的，其腐蚀性是非常之大的，在少部分有落后思想的人当中，还有一定市场。如：“人情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”、“管山吃山，管水吃水”、“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”、“朝里有人好做官”等，都是需要痛加批判的。还有一些谚语是宣扬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，如“眼不见为净”、“耳不听不烦”等。有一部分则是鼓吹宿命论的，如“福至心灵”、“命好不如运好”、“十指九斗，不做就有”等。还有一部分谚语则反映了封建伦理观念、轻视妇女的封建思想。如“一马不备双鞍，一女不嫁二夫”、“十个女人九个妒”、“十个裙钗女，抵不上一个癫脚儿”等。有的则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处世哲学、利己主义，如“出头椽子先烂”、“热心肠招揽是非”、“知足常乐，能忍自安”、“随时随分随时安”等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是带有黄色庸俗成分的。诸如此类的谚语、俗话，我认为都应加以批判，不宜再作为正确的东西加以传播。“去其糟

粕，留其精华”，这就是选注谚语、俗话的原因、根据和原则。

至于为什么要进行浅注短释呢？则是从自己亲身体会中感到的，因为有些谚语、俗话，乍听起来好象懂了，其实并不懂。比如：“四两压千斤”、“肥梁瘦柱”、“拉得紧割得断”、“死猪活羊放倒树”、“编筐编篓全在收口”、“长十六，短十五，不多不少整一亩”等等，其中所包含的道理，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才能理解。还有一些谚语、俗话，道理比较深刻，单就字面理解是不够的，如“饿死不吃无义米”、“少吃一口不饱，少一根柴不涨”、“棋输一着错”、

“文无定法”、“瓜无滚圆、人无十全”等等，需要多想，才能吃透其中的道理。还有一类谚语，如“滴水之恩，也当涌泉相报”之类，虽有一定的价值，但是必须赋予明确的阶级观点。这一类谚语，也需要加以注解说明。还有一部分谚语、俗话，用的是地方方言、土语，也需要注释一下。但由于我的知识非常浅薄，是难于注释好的，其用意在于引起读者的思考，主要是抛砖引玉。在这方面，是极其需要大家多加批评、指正的。

有一些谚语、俗话，由于受定型语句形式的影响，又受压韵、顺口的约束，往往有些极而言之说法，如：“养猪不用巧，圈干食饱”，如果认真琢磨起来，这句谚语就有点绝对化了。因为养猪是要用“巧”的，是应当提倡科学养猪的。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定了这句谚语，它仍有正确的一面，即“圈干食饱”是养好猪的最重要最基本的要求。因此，凡是遇到这一类谚语，既要全面想一想，又不要轻视其

中的正确道理。

在这本集子里，我尽可能地选注了一部分少数民族的谚语。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，少数民族的谚语非常生动，寓意也很深刻，如瑶族谚语：“虹搭的桥不能走，蛇扮的绳不能抓”；维吾尔族谚语：“莫看蛇洞直，要看蛇身弯”；蒙古族谚语：“狼总是狼，虽然它没吃你的羊”；藏族谚语：“不说刀不快，却怨肉没熟”；白族谚语：“恶狗到处碰到木棍”；傣族谚语：“不上树摘不到芒果，不流汗哪能学到本领”；苗族谚语：“破了的铜鼓，敲不响”等等，都别具一种风格。可惜，由于我的知识有限，加上条件限制，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谚语没有搜集到。恳切希望各少数民族同志们和民族工作者能广为搜集，如能把已搜集到的寄给我汇总，更为感谢。如果能出一本少数民族谚语集，这也是我多年的希望。

值得特别一提的是，解放后，在党的教育下，广大劳动人民创造了许多新的谚语，如：“不信天命干革命”、“村看村，户看户，社员看干部”等等。可惜，我搜集得不多，也望各个战线上的同志们广泛搜集，积极提供。

罗里罗嗦地说了上面一些话，只是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坦呈在大家面前，殷切地指望同志们的批评指正。我的最大希望是这本选集能成为引玉的一块砖头，引起广大群众、干部搜集、整理谚语、俗话、歇后语的兴趣，从广大劳动人民创造的语言宝库中，把它发掘出来，使之成为全国人民共同享有的财富。为此，我建议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同志们，把这一工作继续广泛开展起来，组织一定的力量，并号召广

大干部群众提供谚语、俗话，把它集中到语言研究所，有步骤有计划地加以整理、出版，我衷心愿意为此尽力。

李孟北

1978年3月5日

于昆明